

· 语言文学 ·

文学变异学:缘起、发展及前景

胡志红 黄文蕾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8)

摘要: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国际比较文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对以“求同”为旨归的法国实证性影响研究和美国平行研究都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在与以异质性作为可比性基础的跨文明研究有机结合后,不仅将为比较文学学科开辟广阔的学术空间,还将规整比较文学学科失范状态,刷新比较文学的学术版图,从而必将引导比较文学走出危机,迈向新的学术境界。更为重要的是,从变异性的角度阐释跨文化、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可增强接受国在文学交流过程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文化自信,有效抵御文学交流过程中强势文化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思维惯性。

关键词:比较文学变异学; 求同性; 差异性; 跨文明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8)03-0059-09

doi:10.19642/j.issn.1672-8505.2018.03.008

Literary Variation: Origin, Progress and Prospect

HU Zhi-hong HUANG Wen-lei

(School of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ariation is a great break through and innov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which makes revolutionary changes in the empirical influence study of France aiming at “seeking common ground” and the parallel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one side, and combines with cross-cultural studies based on heterogeneity as a basis for comparability on the other. It opens up a broad academic space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regulates anomi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freshes the academic domai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o as to lea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ut of crisis and into a new academic realm. More importantly, studying cross-culture and cross-civiliza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ability can promote the initiative, creativity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of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exchange, and effectively resist the hegemonic thinking inertia deeply rooted in the strong culture.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ariation; seek common grounds; heterogeneity; cross-civilization

文学变异学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曹顺庆教授于2005年首次正式提出的一个比较文学理论术语,是对以实证性影响研究为特色的法国学派、以平行研究为特色的美国学派的传统比较文学研究模式的批判、继承、超越与拓展。因为

法、美学派皆以“求同”作为其基本出发点,研究模式既忽视跨文化、跨文明文学交流过程中文学变异性与文明之间的异质性的客观事实,也否定了接受主体在文学交流过程中的选择性与创造性作用,这不仅严重制约了比较文学的发展,也不断为比较文

收稿日期:2018-02-20

第一作者:胡志红(1966—),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西方文学文化及生态批评研究。

引用格式:胡志红,黄文蕾.文学变异学:缘起、发展及前景[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7(3):59-67.

学带来新的危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变异学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该理论关注文学交流过程中的文学变异现象,并将“变异”研究贯彻到文学交流的始终,从而为世界比较文学增添了新的理论视角。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的提出充分彰显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研究视角的革命性转换,更代表其学术创新,进而为比较文学学科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别样学术空间,真正体现了比较文学正视文化的差异性、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倡导文化的对话性与互补性之诉求,以期消解长期存在于比较文学界或隐或显的文化/文明中心论,进而为构建多元包容的一般的文学理论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此,笔者主要就比较文学变异学兴起的学术背景、变异学理论的提出及其发展概况、其主要研究内容以及其学术意义做简要梳理,以明证变异学研究深沉的学术潜力与宽广的发展前景。

一、法、美学派可比性危机的实质:求同性

尽管比较文学早已被当成了一门正式的学科,但其学科的合法性、理论基础一直遭到来自学科内外人士的强烈质疑,甚至可以这样说,自其诞生之日起,比较文学与危机就一直如影随形。所幸的是,比较文学似乎总能在山穷水尽之际,迎来柳暗花明之境,重获新的发展机遇。

比较文学在诞生之初就遭到了圈外人意大利著名美学家克罗齐的激烈挑战。在他看来,“比较”只不过是任何学科都可运用的方法而已,因而“比较”怎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呢?他甚至还这样说:“我不能理解比较文学怎么能成为一个专业?”^{[1]8}由此他断定比较文学没有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可能。鉴于克罗齐在欧美学界的重要学术影响,他的指责使得比较文学的发展遭受了重创,比较文学也遭遇了第一次重大生存危机。

为了顺利渡过危机,摆脱克罗齐等人对“比较”二字的攻击,法国比较文学开拓者们可谓用心良苦,一改比较文学的初衷,指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而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法国学派理论的奠基者之一基亚反复宣称:比较文学研究的目标实质上是跨国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要不存在关系的地方,比较文学的工作也就结束了。由此可见,比较文学的基础不是“文学比较”,而是“文学关

系”。这样看来,比较文学的宗旨已经发生了质变,具体而言,它不进行跨国间的文学比较,转而研究跨国间的文学关系,经过这样的重心转移,克罗齐等圈外人士攻击比较文学的靶子自然就消失了,比较文学似乎就有了立身的根基。^{[1]9-10}法国学派的学者们就可依据其比较文学定义——国际文学关系史,在弃“文学比较”、重“文学关系”的前提下构建了一套经典的比较文学实证关系研究范式,并逐步确立、完善了其三大理论支柱,即“流传学”“渊源学”和“媒介学”,旨在研究被比较对象之间实证性的“同源”影响关系。

由此可见,法国比较文学学派学科理论框架的建立实质上是在圈内外双重压力的强烈冲击下以牺牲该学科本应有的学科内涵和研究范围为代价的,因而必然带有诸多先天不足。首先,法国学派抛弃了比较文学最根本的特征——“比较”,专注于跨国文学间关系史的实证性影响研究。这种为了回避圈外人士的质疑,主动放弃该学科核心研究领域,进而缩小范围与回避学术争辩的做法,尽管绕开了圈外人士质疑与批评的口实,似乎筑牢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根基,但却给比较文学学科的未来发展留下了严重的隐患,进而导致比较文学学科日后出现严峻的生存危机,这完全在预料之中。其次,放逐比较文学对文学性、审美性的探讨,专注于跨国文学之间的实证性外部事实联系,以确证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用法国学派代表人物梵·第根的话说:“‘比较’这两个字应该摆脱了全部美学的涵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涵义的。而那对于用不相同的语言文字写的两种或许多种书籍、场面、主题或文章等所有的同点和异点的考察,只是那使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借,以及其他等等,并因而使我们可以局部地用一个作品解释另一个作品的必然的出发点而已。”^{[2]17-18}法国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卡雷则进一步缩小比较文学的圈子,即所谓的“精确化”。他曾这样说:“比较文学的概念应再度精确化。我们不应无论什么东西、什么时代、什么地方都乱比一通……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3]1}法国学派企图完全采用冷静客观的科学方法来研究包括审美、心理、文化等非物质的、难以量化的跨国文学

交流现象,用尽可能多的客观事实印证另一客观事实的存在。跨国文学研究成了客观的科学研究。法国学派的三大理论支柱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严格的科学考证厘清“影响”得以产生所“经过的线路”,从而揭示两种及以上的文学间的同根或同源关系,因而同源性就成了法国学派学科理论可比性的基础。这种“线路”的构成主要包含三个要素:起点(放送者)、媒介点(传递者)与“到达点”(接受者)。在考证线路时,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影响源相同。简言之,法国学派是科学色彩浓郁的实证性影响研究,它的可比性是同源性。

随着比较文学学科在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兴起与发展,法国学派奠基者们为建立比较文学学科而采取的避实就虚、转移学科研究重心、缩小研究范围的做法无异于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其所引发的问题日益突出,进而遭到了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们的猛烈抨击。他们大喊比较文学又面临严峻的危机,疾呼比较文学变革、转型。美国学者韦勒克就是推动这一变革的旗手。1958年,在美国教堂山“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韦勒克发表了影响深远的檄文——《比较文学危机》,针对法国学派所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倡导比较文学“回归文学比较”,倡导无影响关系的文学间的“比较”——平行研究。韦勒克指责法国学派已将比较文学变为一潭死水,法国学派存在严重的法国中心主义,将比较文学变成文学外贸,而法国成了输出国,其原因是忽视文学性和审美性,坚持死板的科学实证主义,从而导致比较文学学科“岌岌可危”。韦勒克对法国学派的严厉批判真可谓激活了比较文学这潭死水,推动了比较文学的转型,走向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并将文学性置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将没有实际接触和影响的两国及多国文学之间的研究、文学与其它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门类等)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也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1]12}

美国学派对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强调不仅扩大了比较文学的学术空间,使其在方法论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使学科进一步体制化。这一点,仅仅比较一下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的比较文学定义就可见一斑。雷马克将比较文

学界定为:“比较文学是超越某一具体国家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它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的领域——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学等——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文学与人类其他表达领域的比较。”^{[4]31}雷马克的定义被看作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充分体现了美国学派的特征。韦勒克对雷马克的定义也感到不满,认为该定义依然有人为的限制,因而他认为干脆将比较文学称为“文学研究”或“文学学术研究”,这是一种“无边的比较文学”观。^{[5]8-15}

尽管美国学派重新界定了比较文学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构建了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然而,在曹顺庆看来,美国学派也导致了比较文学的新危机,也即将比较文学导向“无边”的境界,从而有走向学科消亡的危险。

美国学派的比较文学“无边论”指的是学科界定的“无边、无界”,并非地理学概念上的“无边、无界”。从地理学角度看,其研究范围仍然局限于西方同质文明圈的范围之内,走的依然是西方中心主义惯性思维的老路。也就是说,所谓的比较文学研究,实际上还是西方文化圈内的文学比较,而对跨越文明界限的文学比较感到犹豫不决。美国比较文学权威学者韦斯坦因曾这样写道:“我不否认有些研究是可以的,……但却对把文学现象的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的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在单一的一个文明范围内,才能在思想、感情、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而企图在西方和中东或远东的诗歌之间发现相似的模式则较难言之成理。”^{[6]5-6}这一看法,典型地体现了“西方中心论”的比较文学观。这种狭隘的观念,极大地限制了比较文学的国际性或全球性。叶维廉指出:“事实上,在欧美系统中的比较文学中,正如韦斯坦因所说的,是单一的文化体系。”^{[7]5}因此,文化模式问题、跨文化问题,“在早期以欧美文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中是不甚注意的”^{[7]16}。

为什么欧美学者对跨异质文化/跨文明的文学比较的可能性、可行性表示怀疑呢?主要原因在于

法、美学派的比较文学的可比性是基于“求同性”，而排除了差异性、异质性、变异性。曹顺庆在归纳总结法、美学派的基本特征时指出：“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中，比较文学的根本目的是求同，而不是求异，不管是影响研究还是平行研究，其研究基础都是‘求同’，是求异中之同。”^{[8]10} 简单地说，影响研究就相当于文学寻根，也即明证跨国影响的同源性；平行研究探讨的是无实际影响关系的跨国文学间的“类同性”，即跨国文学间和文学与非文学学科之间的一致性、契合性及相似性。

二、跨文明比较文学可比性的重构：差异性

(一) 差异性：解构主义与跨文明研究的基础

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兴起与发展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内外因素强烈驱动使然，大致可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强烈关注差异性的当今世界学术思潮，尤其是后结构主义思潮（解构主义思潮）和跨文明研究两大思潮的有力推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变异学就是这种以差异为核心议题的两大思潮催生的结果，并成为世界比较文学新的增长点。其二是由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自身的严重不足与中国学派苦心孤诣探寻发展比较文学新路径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对差异的重视，甚至从差异的视角来看待事物，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盛行于当今学术界并广泛影响、蔓延到人文学界的后结构主义思潮最为显著的特征，它以不可阻挡之势对西方主流传统思维方式发起了严峻的冲击。西方传统思维的显著特征表现为以构建和探寻中心与权威、统一与同质、标准与连续、规律与秩序、普遍性与永恒性等为宗旨，而解构主义理论则强调以探寻多元与平等、差异与异质、偏离与断裂、混沌与无序、独特性与变动性为目的。^{[9]471-478}

解构主义还特别强调自然与人文之间的分野，并坚持认为自然科学涉及自然领域，人文科学涉及人类生活领域，关乎价值与思想，而这些没有普遍的规律可循，总处于变动不居的过程中，由此解构主义思想家认为，多元共生、差异并存、变化无常乃生机勃勃的现实生活之常态。后结构主义思潮代表人物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就认为：“认识的目的并不是去找出差异之下的共同因素，

而是应当‘差异地’理解差异，因而差异就不再让位于导致产生概念的一般性的普遍特征，而是要使关于差异的研究本身成为当然的东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即着眼于有差异的思想、对差异的思想。”再如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宣称讨论问题的目的是探求“悖论推理”，这种推理以“规则的异质标准”和“对歧见的探求”为视点。他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疾呼：“让我们向总体性开战……让我们激活差异，拯救它的声名。”^{[10]18-19} 也就是说，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主张将差异性看作理解世界的基本观察点，要通过差异的视角去看待、理解、阐释世界，拒斥总体性、体系化、形而上的宏大叙事、普适性和普世性的伦理道德及客观真理等主张，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实行统治他人并让这种统治合法化的手段而已”^{[9]476}。解构主义的这些理论观点无疑为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对于文明间“异质性”探求的执拗提供了扎实思想和理论支撑。

事实上，关于文明之间或曰异质文化之间的不可忽视的、不可消弭的重大差异性问题的，早已成为学界跨文明研究领域激烈争论的热门话题。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的要旨是强调世界上诸文明之间所存在差异的绝对性与不可通约性。冷战以后，文明之间的差异将取代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差异而成为引发新的冲突与战争的主要思想文化根源。他这样写道，“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世界里，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最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11]6-8} 简言之，亨廷顿将文明之间的差异性与异质性推向人类族群之间区别的中心地位。尽管我们对他“文明差异必然导致冲突与战争”的论调未必苟同，但他关于文明间差异性、异质性不可消弭的观点对比较文学学者来说确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后殖民主义理论旗手爱德华·赛

义德(Edward Said)的后殖民理论本质上是基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根本差异而构建的。他通过深刻分析西方建构东方形象的内在文化机制,揭示西方对东方的歪曲、误读及霸权。在他看来,盛行于西方学界的“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西方本体论与认识论差异的思维方式”,东方学学者对“东方”建构的起点是“基于东西方之间的基本差异”“东方学是西方操纵、重构、统治东方的方式”。^{[12]1370-1371}换言之,赛义德认为东西方文明之间存在根本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异,由此导致了西方强加给东方歪曲、霸权的形象建构,其根本目的是为其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建构文化托词。

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也十分关注文明差异问题。他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撰写了《文明的冲突与对话》(2001年)和《对话与创新》两部有影响的著作,倡导文明对话。在他看来,尽管不同文明间存在重要差异,但可以通过创新的对话进行合作,共同应对当今人类面对的许多挑战,进而构建丰富多彩、充满活力的世界。我们“不仅不把差异视为威胁,还将它视为丰富人性的一个机遇”^{[13]13},对此儒家文明能提供切实的文化资源。

概而言之,差异性思维模式或对差异性的关注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基本走向,大有成为学界主流之态势,并深刻影响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引发多学科研究范式的深刻变革,极大地拓展了它们的学术发展空间。当然,以“求同思维”为基本导向的法、美比较文学学派在危机四伏的困境中也不得不探寻突围的路径。在重视与探究不同文明/异质文化异质性特征的全球化背景下,以“差异性”为基础重构比较文学可比性就是走出危机、迎来新发展契机的必由之路。

(二) 差异性:跨文明比较文学可比性的新基点

曹顺庆指出:“现有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忽视了文学比较中的异质性问题。没有学过比较文学理论的人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比较文学是既求同又求异,比较就是求同中之异、异中之同”^{[7]10}。可是,无论是法、美学派还是中国比较文学界都是在“求同”,求“异中之同”。在曹顺庆看来,法国学派是“求同忘异”,美国学派是典型的“求同拒异”^{[14]46},那么,中

国比较文学就是“求同不知异”^{[15]146}。为了追求所谓的共同的“文心”和“诗心”(钱锺书语),“寻求共同的美学据点”(叶维廉语),在具体的比较文学学术研究中,中国学者认为西方理论理所当然具有普适性,亦步亦趋紧追西方的文艺理论思潮,完全认同、移植、照搬西方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运用这些舶来品阐释中国文学,从而导致严重的“失语症”。比如,我们引进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甚至中国古典文学,常常得出可笑荒诞的结论。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不知中西异质文化或文明之间的差异,盲目套用了西方的理论,这也是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问题。因为西方文艺理论植根于西方文化语境之中,在阐释西方同质文化圈中的跨国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时,是有效的、合理的,一般不会有多大问题。然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是互为异质的文化或文明,这些来自西方的“洋理论”在与中国文学相遇时,往往会水土不服,常常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得出可笑荒谬的结论就在所难免了。

由于深受法、美学派求同思维惯性的影响,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们在早期的研究中,也未意识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或曰异质性问题,完全认同、照搬西方的理论,并认其为普适性的理论,因而直接援用西方比较文学的理论,旨在追求中西文学之间的所谓“共性”。这种思维实际上是放弃自己的文化立场,鼓励西方文化霸权,认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迎合法美学派对比较文学中文化优越的追求。

对此,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也提出了批评。于连认为,钱锺书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所倡导的是一种以“求同”为基准的比较文学观,他只讲“同”而忽略“异”,是个重大失误。在于连看来,中西文明相互隔绝的时间很长,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总体上较为稀薄,要构建法国学派式的、以文学间“事实联系”为基础的实证性影响研究模式确有很大的局限性;加之中西思想文化及语言背景之间在根上就存在重大差异,很难在它们之间寻找到对等的概念,因此构建美国学派式的、以类同比较的平行研究也显得盲目和牵强。因此,中西比较文学应该建立一种以差异为前提的比较文学。^{[15]114}

叶维廉在《中西比较文学中“模子”的应用》一文中突出强调中西文学比较中文化模子问题,实质上就要重视中西文化/文明的“异质性”与不可通约性。叶维廉先生在该文中指出:“‘模子’问题的尖锐化,是近百年间,由于两三个不同文化的正面冲击而引起的。”必须有待于“西方人跳出自己的‘模子’,接触到一个相当程度相异的‘模子’以后,才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才会怀疑一个既定的‘模子’的可靠性,才不敢乱说放诸四海而皆准。”^{[17]57}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局限于同质文明之内,以“求同”为其旨趣,这就使它们接触不到陌生的文化“模子”而陷于自动化的境地,以至于难以引发、启动他们的沉思、灵感与创造。要探讨中西文明表层下的深刻文化差异,抛却切莫放弃自己固有的文化“模子”的成见,从彼此的文化立场上去比较,发现两者的共同和不同。他还认为文化之间“歧异之处的探讨和对比更能使我们透视二者的固有面貌,必须先明瞭二者的操作上的基本差异性,我们才可以进入‘基本相似性’的建立”^{[18]11}。东西文化的“模子”实际上就是东西异质文化之间差异性的显现。这种差异性构成了中西文学比较的深层理论背景,在进行文学比较的同时我们必须跨越这种中西文化的壁垒。

“跨异质文化”的比较文学正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独特之处,对异质文化之间的横向比较研究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不排斥法国和美国学派的研究方法,只是要求比较者在从事中西异质文学比较时注意到中西文学背后深层的文化鸿沟。也就是说,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从法国和美国学派的简单注重求同思维,发展到对中西文学横向比较、对话和交流中存在的异质性的关注,求异思维将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和关注的重点。这样才能注意到在跨越中西异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和横向文学研究的特殊性,才具有更为开放的比较视野。

三、文学变异学的诞生及其发展简况

比较文学对不同文明和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重视及将差异性抑或异质性作为跨文明可比性基础的创新性理论观点必将引发对文学交流过程中文学变异现象的关注,进而催生比较文学变异学。

作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视角,比较文学变异

学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关注文化的差异性、重视文明的异质性,在此前提下进行文学沟通交流,必然产生文学变异现象,对文学变异现象的研究就成了变异学的核心议题。再综合曹顺庆对变异学理论的一系列论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的要旨是把“变异性”作为跨文明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基础,从异质性与变异性入手来考察比较文学的相关领域,透过差异性的视野,深入挖掘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及不同学科间文学相互关系的变异性,来实现世界文学、文化、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融合,进而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1]22-34[5]28-30[16]115}这一理论不仅明确地将变异性 and 异质性界定为跨文明比较文学的可比性,而且还重视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中文学的变异性问题。

文学变异学理论的提出可以重新规范比较文学研究范围,治理长期以来比较文学研究中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不明确、甚至混乱的状态。具体而言,“将影响研究分为实证性影响研究和影响的变异性研究。与此同时,将平行研究分为同质性类同研究和异质性类同研究”^{[13]32}。

针对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困境与危机,2005年8月曹顺庆在中国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了以“变异性”为出发点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设想,代表比较文学发展的新方向,即从“求同”到“求异”的转变,从以“影响者”为中心的研究模式到以“接受者”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以“影响”为中心到以“变异”为中心的思维模式的转变,因而能推动世界比较文学的革命性的变革,将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开辟新的学术空间。此后,曹教授陆续撰文或出版专著不断丰富、完善、发展这一理论,希冀让“变异思维”影响、变革中国乃至世界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理路,将自觉的“变异”意识贯彻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始终。同年,曹顺庆在其《比较文学学》一著中解释了他提出比较文学变异学构想的几点理由,即:针对当前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失范现状,针对文学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比较文学研究思维已从“求同”走向了“求异”的转变。^{[5]28-29[8]11}与此同时,该著为比较文学变异学开辟了专章,并初步勾勒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接着,

曹顺庆又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1期)一文中比较全面地阐明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提出的学理依据,指出了变异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和大致范围。2006年5月,曹顺庆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其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第一版),重新规划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版图,即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变异研究和总体文学研究这四大研究构筑比较文学的内容,刷新了比较文学教材编写的传统模式,开创了一个新模式。而后又不断撰文以进一步宣讲、阐发自己的“变异学”观点:如《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03期)、《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重大突破》(《当代外语研究》2010年07期)、《变异学视野下比较文学的反思与拓展》(《中外文化与文论》2011年4月第20辑)、《打开东西方文化对话之门——论“间距”与“变异学”》(《新疆学刊》2013年03期)及《论“跨文化”背景下的变异学研究》(《中外文化与文论》2014年6月第26辑)等一系列论文。更具学术里程碑意义的是2014年曹顺庆在世界知名出版社斯普林格(Springer-Verlag)出版了英文版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专著《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希冀世界比较文学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关注文学交流中普遍存在的文学变异现象,进而让变异学理论推动世界比较文学的变革。该著全面深入地阐发其变异学理论,将“变异”的理念贯穿到比较文学研究的始终,进而刷新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从论文的发表,到专著的出版,我们可看出,变异学理论的内涵不断丰富,说理日益透彻,范围日渐明晰,充分揭示了变异学理论对整个比较文学领域研究的学术意义及其对比较文学学术实践的指导意义和创新价值。英文变异学理论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曹顺庆变异学理论体系已经成熟,以变异视角重构了比较文学的学术理论,重新规划了其版图。《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就是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全面系统阐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的开拓性著作。该著除了《导言》外,主要由五章构成,第一、第二章重点指出了法、美学派的主要不足及比较文学学科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并据此凸显变异学理论提出的必要性与必然性。核心内容

第三、第四及第五章则透过变异学理论视野分析跨越语言、文化及文明语境后的文学变异现象,并对“跨越”之后产生的具体“变异案例”进行透析,充分彰显该理论的重大理论、学术及现实价值。

无论从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资源的发掘、学术观点的提出、研究范围的规整,还是对翻译策略问题的具体理论指导、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未来规划等,变异学的确为比较文学学科开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四、变异学的定义及其主要研究内容

全面分析10多年来曹顺庆对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的论述,我们可以给文学变异学下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研究的支点,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文学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与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所在。^{[14]47[5]30}

具体而言,比较文学变异学主要涵盖五个方面的研究内容:跨国文学现象、跨语际、文学文本、文化及跨文明变异学研究。^{[14]33-34}以下将分别对各研究范围给予更多的介绍。

跨国文学现象变异研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形象变异研究,也称之为形象学。形象学研究异国的形象——“国家的幻想”,即一国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他国的形象。因为它仅仅是幻想而已,因而必然发生诸多变异。变异学视野下的形象学之重点在于研究一国形象在另一国文学想象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形走样,并试图从文化深层面切入探究导致变形走样的带有规律性的文化因素。

跨语际变异学研究,是变异学在跨语言层面展开的研究,主要指文学现象跨越语言障碍,借助翻译,而后被接受者接受的过程。跨语际变异学研究就是对此过程进行研究,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比较文学译介学。受影响研究的影响,传统国内比较文学教材多半都把译介学归入媒介学的研究范围,可译介学自身却涉及很多非实证性的语言和文化层面的变形、变异因素;因此将译介学纳入实证性考察的媒介学研究范围显然不妥。谢天振曾说:“译介学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

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19]1简言之,译介学的关注重点是原文在跨语际转换过程中意义信息的变形、增减,已超越了传统翻译理论对“信、达、雅”的追求,而执着于对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性”进行研究。译介学从初期以“忠实”为基准、实证性为方法论的研究过渡到一种凸显文化因素的文学变异研究,从最初对语词翻译精准的关注到对语词翻译变异的关注,因而译介学已走出媒介学范畴,发展成为比较文学中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文学文本变异学研究主要关注跨文化或跨文明文学交流过程中接受国的文学接受状况,即比较文学接受学,又称之为接受研究,“是建立在西方当代接受美学理论基础上的—种新的比较文学变异研究的研究模式,主要研究—个国家的作家作品被外国读者、社会接受过程中出现的变异”^[1]137。文学接受研究不同于法国学派的文学关系研究,后者只关注发送者A如何影响接受者B,而鲜有研究B如何对A进行接受,后者是以实实在在的客观证据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而文学的接受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广涉心理学的、审美的甚至意识形态的等非实证的精神因素。这些都难以验证,可在变异学和接受美学理论框架内则可得到恰适的解释,由此可见,将文学接受学归入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范围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学术策略。有了文学变异学作为理论支撑,接受研究更关注对接受的历史语境、现实语境及文化语境的研究。这样,比较文学研究就与接受国的社会历史、社会心理、民族审美特质联系在一起,极大地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空间,从而使得接受研究走出传统研究的二元结构之窠臼,使得文学研究在跨文化、跨文明的语境下真正落实了为我性、对话性、变异性^[1]138。另外,文本变异学还包括美国学派平行研究视阈范围内的文类学和主题学研究。尽管这二者研究范围不同,但作为欧美比较文学,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求同”,追求文类或主题间的“亲和性”“相似性”或“类同性”。而客观情况是,在主题学和文类学研究中,主题和文类的变异情况大量存在,尤其在跨文明语境中,文学间除了主题和文类的类同外,更多是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在跨文明主题研究和文类研究方面不仅要“求

同”,更要“求异”,在“同”与“异”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在平等对话中实现互惠、互补,进而更为全面、更为深刻地总结出人类文学的一般规律。

文化变异学研究,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因文化的不同而产生的文化过滤,以及因此而造成的文学误读。文学穿越不同的文化语境必然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异。用叶维廉的话说,就是“文化模子的歧义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学模子的歧义”,这是比较文学学者绕不开的事情。至于文化过滤的内涵,可以这样简单地描述:它指在跨文化、跨文明文学交流中,接受主体从自己的文化立场出发有意或无意地对交流信息进行选择、伪装、渗透、变形等作用,从而造成原交流信息在内容、形式、结构、形象等方面发生变异。一般来说,文化间的差异性越大,过滤程度就越高,变形、变异程度也就越明显,文化过滤是难以分解的多角度、多层面的过滤因素构成的复杂交错立体结构。^[5]273此外,伴随文化过滤必然产生的—个更为明显的文化变异现象就是文学误读。“文学交流活动中主要由于文化过滤的作用,或者说由于发送者文化与接受者文化的差异,而导致发送者信息的减损和接受者文化的渗入,从而造成影响误差或者叫创造性接受,这就形成误读”^[5]284。文化误读像文化过滤—样是复杂多样的、多层次的。从其成因来看,可分为有意误读和无意误读;从其后果来看,可分为消极误读、积极误读甚至创造性误读。对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现象的研究必然深入到生产和接受文学的文化模子、历史语境、审美取向等因素的研究,从而使得比较文学研究发展成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这样既可扩大主体文学的意义内涵,也可拓展接受者文化的应用范围和解读方式,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基础上彰显自己民族文化、文学的个性特征。

最后—方面是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典型的例子就是跨文明对话和话语变异研究。曹顺庆用美国学者赛义德的“理论旅行”的观点解释跨文明话语变异问题,也就是说,当—种理论从—个国家或—种文化“旅行”到另—个国家或另—种文化以后,这种理论话语必然会产生变异。针对我们当代的学术语境,我们所应用的理论大多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它们“旅行”到中国后,必然在两个方面发生变

异。其一是中国学界完全认可西方理论具有普适性并生吞活剥地运用它阐发中国文学,中国理论随之退场,从而导致中国文论的“失语”。其二是西方文论的中国化。具体地说,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文论时,以我为主,本着自身文论需求的基本立场进行筛选,对西方文论选择性地吸收并加以改造,借助外力推动中国文论的发展,以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论的“失语”状态。^{[8]13}至于话语变异,中国学者提出的“阐发法”是最为典型的例子。这种方法提倡用西方文论来阐发中国文学,这必然导致西方文论和被阐发的中国文学现象和作品都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比如,中国学者用生态批评理论阐发《道德经》。在跨文明的语境中,一方面发掘了《道德经》别样的生态内涵,有助于推动包括《道德经》在内的中国经典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也必须进行修正或拓展,以有效地阐发其他文化或文明的文学文本。换句话说,它必然发生变异。这是由于中国生态批评学者具有自觉的文化自信与本土文化意识,认识到中西文明之间的生态异质性^{[20]176-180}。大而言之,异质文明之间可以相互阐发、相互激发,这是中国比较文学变异学从差异性角度出发对跨文明研究所做的有益探索。^{[8]13}

结语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国际比较文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对以“求同”为旨归的法国实证性影响研究和美国平行研究都进行了革命性变革,在与以异质性作为可比性基础的跨文明研究的创生性有机结合以后,不仅将为比较文学学科开辟广阔的学术空间,也将规整比较文学学科失范状态,刷新比较文学的学术版图,从而必将引导比较文学走出危机,迈向新的学术境界。更为重要的是,从变异性的角度阐释跨文化、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可增强接受国在文学交流过程中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文化自信,有效抵御文学交流过程中强势文化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思维惯性。

当然,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比较文学变异学还很年轻,其各研究领域尚需进一步完善,在该理论指导下所产生的创造性学术成果还不多,但我们理由相信,该理论在进一步明确规范学科研究领

域和解决当前面临的诸多学科危机方面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与此同时,有了该理论指导,在可望的将来,必将会产生丰硕的创新性学术成果。

参考文献:

- [1] 曹顺庆. 比较文学教程[M]. 第二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 [2] 梵·第根. 比较文学论[M]. 戴望舒,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7.
- [3] 基亚. 比较文学·1951年初版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
- [4]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5.
- [5] 曹顺庆. 比较文学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
- [6] 韦斯坦因. 文学理论与比较文学[M]. 刘象愚,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7] 叶维廉. 比较诗学[M]. 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83.
- [8] 曹顺庆,徐欢. 变异学:世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的突破[J]. 当代外语研究, 2010(7).
- [9] MARVIN Perr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3.
- [10] 陈嘉明,吴开明,李智,等.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 [11]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2.
- [12] EDWARD Said. Introduction in [M]//Ed. Hazard Adams and Leroy Searle.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3] 杜维明. 对话与创新[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 [14] CAO Shunqing. The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2014.
- [15] 曹顺庆,张雨. 比较文学变异学的学术背景与理论构想[J]. 外国文学研究, 2008(3): 142 - 149.
- [16] 赵渭绒,曹顺庆. 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新思考[J]. 外国文学研究, 2012(3): 111 - 119.
- [17] 李达三,罗钢. 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 [18] 叶维廉. 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
- [19] 谢天振. 译介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9.
- [20] 胡志红. 生态批评与《道德经》生态思想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9(9): 176 - 180.

[责任编辑 李秀燕]